

捐躯赴国难

● 李动

建党百年之际,禁不住想起无数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中共党员,我的外公房栋泽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凝望着外公的烈士证书,感佩他的慷慨赴死,更提醒自己勿忘国耻。

外公生前是鲁西南八路军六支队三营扩军办主任兼党支部书记。1940年农历7月14日深夜,外公潜回山东长清县房庄家里办急事并筹款,翌日清晨,院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疯狂的砸门声。他深感不妙,立刻躲到隔壁房世昌家。一群日本鬼子砸不开门,便翻过墙顶纷纷跳进院子,冲进房屋搜寻,外婆抱着受惊哭闹的阿姨,也吓得六神无主,舅舅和母亲见状更是吓愣了,然而,在危急关头,为了孩子安危,外婆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
十来个鬼子在房世昌家的蚊帐后发现了外公,野蛮地用三八大盖砸向手无寸铁的外公,用绳子五花大绑了外公和犯有“窝藏罪”的房世昌,耀武扬威地押向四台山据点。

一天没有动静。静静的月光泻进凄清的小院,老槐树的叶子在院墙上描着斑驳的影子。外婆哄着四个儿女睡着后,心里始终惦着被抓走的外公。突然门外传来轻轻叩门声,警觉的外婆迈着小脚疾步来到院里拉开门栓,见是外公的姐姐,她悲愤地说:“弟弟已被日本鬼子杀害。”如遭电击,外婆脑子一片空白。大姑姐哭诉道:“四台山上不断地传来惨叫声,弟弟整整哀嚎了一整天。”

约一个时辰,外公的尸骨被拉回来了。四台山据点离房庄约三里路,一路上都是点点滴滴的鲜血。如豆般昏黄的灯光下,外婆见外公身上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,腿上都是烧焦的印痕,青一块,紫一块,头上还有两个枪眼,惨不忍睹。外婆抚摸着遍体鳞伤的外公,号啕大哭。大姑姐拍着外婆提醒道:“别让汉奸发现了。”外婆强忍着泪水,从失态中镇定下来,翻出外公的衣裤,用水轻轻擦净外公血肉模糊的身子,小心翼翼地给他穿上。外婆如万箭钻心,痛不欲生,但为了四个儿女,她强忍悲愤,支撑着精神大厦绝不能坍塌。

小院里传来了悠长的鸡鸣声,老乡拉着板车上的外公出了院子,外婆迈着的碎步紧随其后。淡淡的晨雾笼罩着透迤的乡间小路,外婆恋恋不舍地目送着板车消失在如血的晨曦里。

鬼子不知房世昌也是中共党员,将他作为窝藏犯毒打一顿天亮走人。房世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,见了外婆哭述了外公被惨害的经过。

鬼子将外公押至据点后,将他吊在铁链上,皮鞭抽、上虎凳,甚至用烧红的铁棍烫,外公被折磨得嗷嗷直叫,在严刑拷打之下,他坚贞不屈,决不招供部队的驻地,沉默到底!鬼子轮番拷打,至凌晨见他仍不投降,大失所望,打着哈欠睡觉去了。

鬼子走后,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外公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呻吟不止。他有气无力地对身边的房世昌说:“好兄弟,快给我

解开绳子。”惊魂未定的房世昌望望四周悄然无声,小心翼翼地捆帮外公解开绳子。外公不顾一切地爬起来蹒跚地钻进了沉沉的夜幕。

刚溜出去不久,就惊动了狼犬。站岗的鬼子鸣枪牵着狼犬大呼小叫地向黑影追去。遍体鳞伤的外公浑身乏力,加之一天水米未沾,踉踉跄跄没跑几步便力不从心,情急之下猛然翻身向山下滚去,滚至田边抬眼望去,只见闪着绿光的狼犬和黑影步步逼近。外公深知逃生无望,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穹,怀着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悲壮,艰难地爬到附近苔痕斑驳的井边,纵身一跃跳进了幽黑的井里。鬼子随狼犬蹒跚至井边,向井里开枪射击,从井里打捞出外公的尸体,又惨无人道地向外公的头颅补了两枪。

房世昌哭述毕,提醒外婆:“大姐啊,赶紧带着孩子们跑吧,鬼子不会死心的,可能还会来抓家属。”外婆匆匆收拾了一下,背上襁褓中的阿姨,一手拉着3岁的小舅舅,一手挎着包袱,蹒跚地迈着小脚,携8岁舅舅和7岁的母亲,沿路乞讨,走上了漫漫逃亡路,小舅舅在途中拉肚子夭折。四年多后,外婆送13岁的舅舅参加了八路军,走上了抗日的战场。



■ 国色天香(摄影)

阿元

桂馨苑

刊头书法 瞿国平

这个忙,帮“倒”啦!

● 顾海鹰

我曾经因为好心帮过一个“倒忙”,要不是遇上了两位认真负责的专家,还不知道会是个怎样的结果,有时想来真有点后怕。

事情还得从头说起。那天夜里10点多钟接到好朋友玲的电话,她急呼呼地说要我给医院的医生打招呼,能不能别开刀。原来,她去常州旅游,突发剧烈的腹痛,我知道玲经常腹痛,但她说这次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重,在当地医院妇科急诊处理后,她就回上海住到我所供职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。我赶紧打听值班医生是谁,我在电话里帮玲说情,能否保守治疗不开刀。听得出电话那边有点犹豫,但总算给了我“面子”当晚不开刀了,玲得知愿望满足后很开心。

第二天我到病房,妇产科主任罗来敏教授对我说,用了大剂量的抗菌素,还是没效果,病人虽然有盆腔炎的嫌疑,但也不排除其它疾患。罗主任很负责,请来外科医生会诊,诊断为“肠梗阻”,而引起梗阻的原因一时却无法断定。因为玲怕开刀,拒绝“剖腹探查”,这样又拖了二天。

第三天的晚上,外科专家杨喆医生正和同事在食堂吃饭,无意中听到医生们在议论玲的病情蹊跷,临床经验丰富的杨主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,放下饭碗就到玲的病床前进一步为玲检查,罗主任为了玲的病情观察那天晚上还留在医院。二位主任一商量,果断决定立即急诊手术,玲的丈夫说服了她接受了手术。

打开腹腔,医生们都惊叫起来,原来玲的子宫圆韧带带有2个先天性裂孔,每个裂孔大约5厘米,肠子嵌顿在这2个孔里,形成“腹内疝”,嵌顿的小肠都已发黑坏死。玲坏死的肠子被切除了,手术很成功。

事后,罗主任对我说,她从医三十多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,尽管这是一个罕见的病例。但我想,如果我不为玲去“说情”,而是劝她听从医生的安排早点“剖腹探查”,或许她的肠子还能保留得多一点,痛苦还会少一点。

这件事给了我教训,以后遇到类似的“忙”,必须三思而后行,我可不能再帮“倒”忙了,人命关天哪!病人还是要多听听医生的话吧。

红色弄堂

(节选)

作者 张晓栋

HONG SE LONG TANG

从出动的军警数量来看,应该来自薛立华路(今建国中路)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,因为更近的霞飞路格罗路(今淮海中路嵩山路)巡捕房的人手没有这么多。薛立华路的中央巡捕房此时是随法租界的西扩刚刚设立的。

显然,望志路106号不能再继续作为会址开会了。但是,会议的议程还没有结束。于是,代表们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,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,在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会议议程,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,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

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,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能明确,只能确定为七月。因此,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。1949年以后,经过多次实地探访,不仅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

会址,更可喜的是,经党史界通力合作研究,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有了结果。原来,当初的代表们不全住在博文女校,例外者之一就是广东代表陈公博。陈公博当时新婚,偕夫人单独入住南京路上新建成的旅馆大东旅社。好巧不巧,在他们入住期间,隔壁房间发生了一件惊动整个上海滩的凶杀案,上海各新闻媒体都做了报道,而陈公博有记日记的习惯,将这些都记在了日记里。研究者在反复核对后,终于确认了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,但这不妨碍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的决定。

1990年,作家叶永烈拜访已介耄耋之年的薛耕莘,他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。薛告诉叶永烈,当年闯进一大会场的陌生人名叫程子卿,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,程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共一大之事。

程子卿是帮会中人,与三教九流都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。薛耕莘有个习惯,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上。当时,他曾记下与程子卿的谈话内容。新中国成立后,薛耕莘被捕入狱,他的笔记本被收缴。倘若从档案部门寻觅,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,看到当年他记录的原文。现在,他虽不能回忆出原文,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件事,他记得很清楚。

也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。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听到开会的消息,故意先去盘查,弄出一点动静,让与会者警惕。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,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并未被捕。

薛耕莘是1930年才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。当年闯进一大会场的人是程子卿,现在只是孤证。

兴业路76号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。(下)

树德里,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

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